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中国当代文学 世俗性与革命性关系研究

(1942—1965)



任茹文◎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世俗性 与革命性关系研究

(1942—1965)

任茹文◎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世俗性与革命性关系研究(1942—1965)/任茹文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309-12352-4

I. 中… II. 任… III.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6685号

中国当代文学世俗性与革命性关系研究(1942—1965)

任茹文 著
责任编辑/陈沛雪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203 千
201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2352-4/I·1004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茹文随我读博士学位之前，在浙江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我知道她的兴趣点在张爱玲研究和“十七年”小说。我不是“张迷”，尽管喜欢读张爱玲的小说散文。茹文将她写张爱玲的书送我，我觉得她有很多自己的研究心得。关于张爱玲，我们师生之间讨论很少，话题更多集中在“十七年”小说方面。这看似不相关的两个领域，实际上隐含了新文学的一个重要话题：“革命性”与“世俗性”的沉浮消长。在读博期间，茹文写作了论《青春之歌》的文章，后来发表于《文学评论》。这也意味着，茹文通过阅读张爱玲和杨沫，对文学的“世俗性”与“革命性”已经有了个案研究。——这是我后来和茹文讨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和研究内容能够找到共识的一个基础。现在我们读到的《中国当代文学世俗性与革命性关系研究》便是茹文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专著。

我记不清茹文读大学本科时，我是如何给他们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我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叙事”的大环境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的，遥远而又贴近的“革命”给我这一代人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革命”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完成了大学教育，也完成了对“革命”和“革命”成果的反思。这个反思的结果之一，便是在之前“革命叙事”的背景中，加入了人、人性、人道主义等要

素。因此,我们虽然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确实重新认识了“革命”的另一面。随之而来。关于“革命文学”“革命叙事”的评价也有了比较大的调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框架和评价标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我仍然为崇高的“革命叙事”动容,为抒情的“革命叙事”动容,但同样喜欢汪曾祺式的小说,在世俗社会场景中分享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人性之美。这不纯粹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和作为世俗化运动的现代化的影响。即便在“革命”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生活的苏北水乡小镇,“革命”也未完全覆盖世俗生活,或者说,部分世俗生活在“革命”的装饰下仍然滋长着。我不知道,我在转型时期的这些想法,有没有给当年的茹文以一定的影响。

茹文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读书和研究学术的。对于她来说,“革命”已经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而是一个“后革命”的时代。她和她们这一代已经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尽管“革命”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对许多人来说,“革命”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回避的或者绕开的话题。但对茹文和她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而言,“革命”是一个无法回避或绕开的话题,由“革命”和“现代化”而生的、存在差异的不同价值观无疑也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撇开这个宏大话题,在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如何评价作为历史和生活的“革命性”与“世俗性”,如何解释当代文学中的“革命性”与“世俗性”,如何阐释“革命性”与“世俗性”的关系,等等,都是需要面对和研究的问题。在这里,茹文要对“革命性”和“世俗性”作多重的处理,关键问题则是她基于历史和学理的价值判断。茹文对“革命”有理解和同情,也有反思;

对“世俗”有情怀和喜爱,但也有批判;而文学是“非日常生活”,需要在审美层面上讨论“革命性”和“世俗性”的意义。——在这两个基本方面,茹文的思路、观点和方法是值得肯定和注意的。

《中国当代文学世俗性与革命性关系研究》以 1942—1965 年为时间段落,是茹文认真思考的一个选择。在她看来,1942—1965 年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时段,它是新文学从现代启蒙思想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向的重要时期,在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段文学史、尤其是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与艺术价值的问题上,当下学界存在分歧与争议。这个分歧的关键点其实就是如何评价“革命的世俗生活”和文学的“革命性”。茹文的基本思路是:将 1942 年至 1965 年这一段当代文学作为具有自身话语系统的相对独立阶段,从“革命的世俗生活”这一特定视阈出发,以“世俗性”及相关概念为中心对此进行梳理和讨论,审视 1942—1965 年中国文学在作家—文学—语境三者关系上的具体状况与特点。这个思路和由此展开的论述,包含了茹文的一种学术理想,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之外,多一个讨论文学创作、文学史的维度,即引入“世俗性”这一概念,并和“革命性”相关联。茹文认为,对 1942—1965 年的中国文学研究,我们已经将过多的兴趣放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这对于辨明这一段文学的特殊性质固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然而,如将过多的兴趣纠结于此,往往容易形成文学史与政治史硬性捆绑的研究困境。她主张,我们一方面要将文学放回社会生活的宏观潮流中作整体的有机的描述,另一方面还应将文学从思想文化史、社会发展史的整体构成中抽取出来单独考察,这对于强调文学的专门性质、弄清文学作品的细部特征更有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说清一些文学本身的情况与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中,她引入“世俗性”及相关概

念,试图以更具延伸性、普适性的文学研究视角,来讨论 1942—1965 年的中国文学。

茹文的选择是一个难题。无论是“革命性”还是“世俗性”,论其一面都十分不易。当茹文试图在讨论文学中“革命性”和“世俗性”的关系时,她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关联点。茹文用了“革命世俗观”和“革命的世俗生活”相对应,来处理这样一个复杂问题。茹文的基本认识是,应当还原革命的世俗性本质与多样化面目,尤其是理解它与人类常态生活的联系处与断裂处,重新看待革命与常态生活、“革命文学”与“文学整体”的内在联系。由此出发,她发现,革命虽与常态生活相异,但并不排斥日常生活,且可视作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革命文学虽可能与讲述日常生活的文学相异,但与文学表现人及人性这一基本命题并不相悖,假如我们以这样的“革命世俗观”来重新考察和讨论 1942—1965 年文学的具体情形,那么,当代文学变迁史可说是一部文学“世俗性”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或得失胶着的浮沉进退史,这也是革命世俗性与 1942—1965 年中国文学的内在关联性。茹文在这里适度消解了“革命性”与“世俗性”的紧张关系,虽然呈现了“革命性”与“世俗性”复杂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打开了讨论“革命性”与“世俗性”的空间。在具体的论述中,关于人性与阶级性、革命与婚恋、社会风尚与革命仪式、私人场景与公共空间等问题的讨论,都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这对我们重新讨论“革命文学”是具有启示性的。

在读博士期间,茹文去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彬彬兄指导下学习一年。博士毕业后,茹文又去斯坦福大学访学半年,受到王斑兄的影响。再加上作为导师的我,茹文转益多师,可能受到一些复杂的影响。这在她写作论文和后来修订论文的过程中有所呈

现。所以,我一方面要感谢彬彬兄、王斑兄的指导,另一方面也期许茹文有选择地接受我们的影响,形成自己更为清晰的价值判断,深化和创新本领域的研究。茹文是一个自我期许高、严于律己的青年学者,不紧不慢,非功利地看待学术研究。我赞赏这样的态度,也希望她“适度紧张”地从事学术研究,通过写作不断激活自己的创造力。我相信,《中国当代文学世俗性与革命性关系研究》的出版,是茹文问学生涯的一个新的开始。

王 尧

2016年1月于三槐堂

目 录

序	1
导论：世俗性视域之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	1
一、“1942—1965 年中国文学”的范围与界定	1
二、世俗性、革命性与革命世俗观	7
三、世俗性与 1942—1965 年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 及研究思路	11
第一章 意识形态规约与文学演化	15
第一节 文化语境的引导、规训与惩罚	15
一、“人民的文学”的基本方向	16
二、“歌颂与暴露”的立场平衡	22
三、出版传播的瓶颈控制	27
第二节 20 世纪 40—60 年代文学演化的三阶段	33
一、多质含混的“延安文艺”(1942—1949 年)	33
二、话语调整的模糊地带(1949—1958 年)	37
三、世俗化写作的时代禁锢(1958—1965 年)	43
第二章 人性与阶级性	47
第一节 进步历史观与普遍的人性	47
第二节 革命斗争在世俗意义上的起点与归宿	56

一、革命与暴力复仇	56
二、革命与土地财富	60
三、革命与爱欲诉求	65
第三节 世俗幸福的流向与分配	68
第三章 革命与婚恋	75
第一节 英雄的恋爱与革命	75
一、与革命矛盾的恋爱	76
二、被革命保护的爱情	78
三、被恋爱置换的革命	79
第二节 大众的情感与家庭模式	87
第四章 社会风尚与革命仪式	100
第一节 民间风尚与世俗信仰	100
第二节 革命仪式下的伦理逻辑	116
一、嫁接	117
二、颠覆	120
三、模拟	122
第五章 私人场景与公共空间	125
第一节 革命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	125
一、战斗指挥部	126
二、旧祠堂里的批斗会场	126
三、新的县政府与区公所	127
第二节 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冲突与融合	133
一、将空间冲突置换为情理冲突	135
二、将空间冲突置换为城乡冲突	138
三、将空间冲突置换为知识者与劳动者的冲突	143

第三节 日常生活本质化	147
第六章 《青春之歌》研究:创作心理与形象学阐释	155
第一节 作者杨沫与《青春之歌》的创作心理	155
一、“成长小说”的心理传统:追忆青春与体味成长	157
二、疾病的转移与死亡的逃离	162
三、气质、经历与语境的合流	167
第二节 林道静的形象学与流变阐释	173
一、从病女到良妇	173
二、从良妇到女革命家	179
三、女奴终结以后怎样:白流苏与林道静的两条路	185
第七章 孙犁研究:时代之风与美学个性	188
第一节 大时代与小环境	189
一、幼年影响与人格形成	189
二、动乱的时代与传统的影响	190
三、去延安	193
第二节 美学风格与创作心理	197
一、苏联作家影响	198
二、团圆之美	201
第三节 审美个性确立于时代中	205
一、时代语境	206
二、迂回反抗	209
第八章 革命文学:本体特征与研究思路的拓展	215
第一节 大众、作家与文本:革命文学的先天特性	215
一、大众需求	215
二、作家的身份期待与文化理想	221

三、革命文学的先天缺陷:日常悲剧感的消泯	232
第二节 中国革命文学研究的可能理路与方法论问题	238
一、海外革命文学研究的主要观点	239
二、在美学与政治融合度的基点上重评文学价值	240
三、在族裔建构的整体中看待革命文学的产生机制与 文化意义	242
参考文献	251
后记	255

导论：世俗性视域之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

一、“1942—1965 年中国文学”的范围与界定

与政治事件相联系和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中,论者一般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逻辑起点。然而,即便是将 1949 年作为当代文学开端的文学史著作,也普遍将“延安文学”作为当代文学之一部分加以阐述。1942—1949 年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无疑当被视为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①从历史演化过程与文学内在关联来看,“延安文学”(1942—1949)、“十七年文学”(1949—1965)与“文革文学”(1965—1976)这三个时间段,总体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形态和话语系统,尽管这三个时段的文学本身存在语境与形态的差异性,但它们依托于特征一致的政治文化语境,并遵循革命话语范型的统一构成规则,显示出文学的高度组织化和统一化特点。中

^① 将“当代文学”入史的冲动与实践几乎与当代文学的自身进程相伴生,迄今已出版林林总总的当代文学史近六十部,其中较为代表性的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中师院中文系编)、80 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十院校编写组);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与多元化,又相继出版了多部当代文学史著作,具代表性的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

国社会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演变历程中,1942年无疑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化的未来状态。1942—1965年间的当代文学演化具有整体性、延续性和内部的因果联系,如文学创作的外部政治环境的调整与变化、工农兵文艺方向、政策与相关理论主张的提出、文学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冲突与重新组合的基本情形,作家创作情感和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学作品审美性与世俗性等因素的演变。因此,笔者将1942年至1965年当代文学这一阶段作为具有自身话语系统的相对独立阶段,拟从“革命的世俗生活”这一特定视域,以“世俗性”及相关概念为中心对此进行梳理和讨论,审视1942—1965年中国文学在作家—文学—语境三者关系上的具体状况与特点。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总结,人们开始重新考察并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的先天性质、具体形式及历史意义。1980年代,由于文学性的回归而出现对革命文学再解读再评价的集中性思潮;1990年代,对社会正义和民族共同体的追寻而再次出现对革命文学理性重估的学界升温。1942—1965年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时段,它是当代文学从现代启蒙思想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向的重要时期,在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段文学史、尤其是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与艺术价值的问题上,当下学界存在分歧与争议。分歧和争议一方面来自这一段文学史本身的复杂性,它先天地带有政治实践初期文学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则来自研究者们所持文学观的差异性。现代启蒙思想中“人的文学观”与政治实践中以阶级为中心的“人民文学观”,成为评价这一段文学史两种不同的理念范畴。随着研究的迂回深入与学术理性的逐步回归,我们应该看到,通过回到文学本身的阅读、体悟与阐释,通过文本阐释与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式观照,以一种反向的政治定性法取代以前那种正向的政治定性法的简单做法正在逐步得到纠

正,无论对这一段文学史持肯定或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在纠正对这一段文学作简单否定和粗糙解释这一研究误区的看法上是基本一致的,这种状况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重评”“重读”当代文学红色经典时曾有的激愤气氛和偏执情绪,在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学术理性的深化上无疑是一种进步。对这一段文学史的当下研究,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需要强调,这两个问题也是本书论述过程中试图把握和坚持的重心。

一、坚持文学研究的审美性不应让位于文学史研究的线性时间观这一基本理念。1942—1965 年中国文学相对于百年中国文学来说不过是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时间段,它也许只是 19 世纪末开始的文学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在很长时段范围内它尚不能从全貌上被定性的一种文化实践的一个阶段。因此,以文学演化的时间维度梳理这一段文学史固然有历史观照的重要意义,但在当前情况下,如过于强调这一段文学形态的时间线索,文学研究极易陷入政治事件演化的进程中难以分离和超越。对于文学的叙述与阐释,应当、并只应当建立于具体文本的评析之上,它不应被产生文本的时代背景的历史学叙述完全取代,文学研究说到底是不能偏离审美体验和艺术衡量这一轴心的。文学作品的写作与阅读固然受政治、经济和时代文化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以文学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学史观处于 20 世纪中外文学史观的核心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的审美感性应该为历史研究的线性时间观所操控,线性时间观的权威地位极易最终导致我们以进化论观念来理解和阐释文学,以社会现代化这唯一价值指标、去建立各时段文学之间的联系、区别与比较,将某一阶段的文学与其前后的文学样貌作比较,在线性时间观的习惯思维中求得某段文学是进步或是倒退的妥帖结论。在这种线性时间观的左右下,1942 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很容易在我们对文学现代化的理想和想象中,被认定为文学发展史上的一

段“倒退的开端”,从而为整体地、本质地否定 1942 年以后的文学提供逻辑依据。这实质上是放弃了以文学审美的普适标准与共通价值观、在中外文学的远景视野中理解和阐释当代文学的可能性。本质上,这种简单做法固然省力,但对于我们更为具体地探索 1942—1965 年文学的内部复杂性和局部丰富性无疑是无益的。

二、相比那些对革命文学厌弃的、激烈的批判性评价,我更倾向于对这一时段中的作家作品秉持一种不抛弃时间维度、还原历史语境、设身处地的平实中肯之论。自 19 世纪中叶至整个 20 世纪,“革命”这一核心词曾深刻地左右着中国人的命运,它左右和改变着中国人想象、建构、虚构现实与历史的方式。20 世纪,几乎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变动都与革命紧密相关,即便在“告别革命”的诉求出现之后,“革命”依然是我们绕不开的关键词。当下,对以革命为历史背景的这一段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一种较明显的普遍倾向,混合着个人情绪、记忆和生存经验的“革命观”有时代替了我们对革命的客观认知。^①建立在对这一段历史的切身生存体验基础上的反思性批评,它曾有效地推进了当代历史和当代文学史的思想进程,也曾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众多主流知识分子有效的话语资源和思想背景。反思革命、告别革命的话语之所以血透纸背、撼动人心,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众多学者具有关于那段历史切实的生存体验,很多论著中的革命印象往往混合着深切的个人体验与生存记忆。当然,这种带着体验与记忆的反思固然有它的力度,更具有历史后来者所不能企及的

^① 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中曾对“革命”一词作过相对客观的考释:英语 revolution 一词源自拉丁文 revol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经 14 世纪、16 世纪后,转生出政治含义,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和 1789 年的“法国革命”,使“革命”一词在政治领域里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显然,无论指天体运动还是人类社会实践,“革命”一词从词源上考释即带有“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的本来含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

感同身受；但须指出的是，过于依赖个体体验与记忆的批评也有它难以克服而又不易觉察的自身局限，体验和记忆极有可能对论者的判断构成一种限制性参照。因为，即便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经验”，也并不见得完全可靠，过于依赖个体经验的历史判断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相同的生活在不同的个体那里所留下的情感和心里痕迹千差万别，对一代人和一段长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的影响也是复杂含混的；在即便相同或相似的历史记忆中，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人群往往又借此安放各自的期望、寄托各自的想象，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转型和重组中的“后革命”的当下，对这一段中国历史更是缺乏相对统一的概念和整体的评价。

总体来看，在含混复杂的历史评价之中，弱化我们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线性时间观的学术思维惯性，放弃为一段文学史贴“进步”或“倒退”标签的进化史观立场；弱化混合了个人情绪与体验的革命印象，以更为理性和宏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一段文学史，对拓展当前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将更加具有建构性。只有深入文本自身的话语世界，在文本的形象性、情感性和审美性、文本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深度与程度、文本在艺术追求、价值、贡献等问题上作出更为清晰具体的梳理，才能从这段文学史中挖掘出更加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文本，也才可能将这段文学史中更具有文学普适价值的作品留存后世。譬如，对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价值高下认识是当前学界的争论焦点之一。事实上，这种争论多少还受着题材决定论和文学进化史观思维的影响，争论焦点依旧集中于创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缺乏对文学作品本体性因素的仔细辨析。本质上讲，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无时代之分，也无题材之分，先秦文学、唐宋文学与近现代文学不会因其所产生的时代和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而决定高下。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差异甚大，但唯一的衡量标准只在于作品为读者所展现的世道人心的深广度，及作品在传统与创新间所